

史海
钩沉

儒家经典与判决说理

左连璧

《毁方瓦合判》是唐贞元十九年(803年)“书判拔萃科”的考题,《全唐文》载有元稹《毁方瓦合判》的判词。因为唐代官试判牒的评断标准,是以儒家经义为依据的,元稹在此判中引用儒家经典原文很多,在仅有一百多字的判词中,就直接引用原文两处,引用有所改动的原文两处,使判词的说理更加透彻。

“毁方瓦合”一词,出自《礼记·儒行》:“慕贤而容众,毁方而瓦合。”东汉郑玄注:“去己之大主角,下与众人小合也。”唐代孔颖达疏:“慕贤而容众者,以见贤思齐,是慕贤也;泛爱一切,是容众也。毁方而瓦合者,方谓物之方正有主角锋芒也,瓦合谓瓦器破而相合也,言儒者身虽方正,毁屈己之方正下同凡众,如破去主角与瓦器相合也。”通俗点讲,就是毁去棱角,与瓦砾相合,比喻屈己从众。

“毁方瓦合判”的案情是:“太学官教胥子‘毁方瓦合’,司业以为非训导之本,不许。”即太学学官教导贵胥子弟“毁方瓦合”,磨去锋芒棱角,像破瓦一样与众相合。国子监的副长官——司业不准许,认为此举并非训导之本。

元稹就此案所拟的判词,大体有三层含义:

一是亮明观点。“教以就贤,虽无黜下,俾其容众,则在毁方。太学以将务发蒙,宜先屈己。”即太学官负责教导贵胥子弟,虽不应以世俗浑浊之风侵染于下,意在使人近贤,但若耍宽和容众,就有必要除去自己方正的棱角。太学以启蒙为己任,应当首先教以屈己从人。

二是摆出论据。“君子不器,须怀虚受之心;至人无方,何必自贤于物。爰因善诱,式念思恭,将戒同尘之诚,遂申合土之誉。况卑以自牧,仲尼尝述于为儒;礼贵用和,子张亦非于拒我。”元稹两次直接引用儒经原文,如“君子不器”,出自《论语·为政》“子曰:君子不器”,意为君子不应拘泥于手段而不思考其背后的目的。又如“卑以自牧”,出自《周易·谦卦》“谦谦君子,卑以自牧也”,意为谦卑自守。两次引用自己有所改动的儒经原文,如“须怀虚受之心”,本出于《周易·咸卦》“山上有泽,咸,君子以虚受人”,意为君子用谦虚的态度来接受他人的言行。“礼贵用和”,本出于《礼记·儒行》“礼之以和为贵”,意为礼的作

用就在于以和为贵。

元稹引用这些儒经,说明有道义者是不该倨傲的,君子应当虚心包纳,不应孤高自傲。学官引导学生常思恭顺,以和光同尘,随时自处自诚,好比和合泥土制成陶器。孔子也主张谦卑自守,屈己容众,不疏远自己不认可的人。

三是作出结论。“义存无傲,道在可嘉,长善之本不乖,成均之言何惜。”有道义者不该是倨傲的,学官的言行符合教育之本,而司业的言论简直就是昏聩无知。

唐代尊经重儒,朝廷治理国家,以德礼为政教之本,体现在取士选官中,自然也要以儒经作为选中登第的判断标准。“毁方瓦合判”看上去是“太学官”和“司业”的纷争,实则是要求考生围绕教育学生交友与处世之道展开议论。元稹的判词既符合经籍古义,又折射出他的现实主义教育理念和君子容众的处世主张,考试后当然会榜上有名的。

纵观中华法系历史,历代官吏判决案件,类似元稹这样引经据典抒情说理的比比皆是。这是因为在中华文明史中,一大批经典代代相传,深刻地影响着国人。由此突发联想,当今的判决书尤其是民事判决书,对那些发生在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,甚至于父母子女之间,因房产、遗嘱、钱财等纠纷,在法庭上一较高低争来夺去的,是否也可以适当引用《论语》《孝经》以及唐诗宋词等传统经典,增添些伦理人情和道德规劝之词,以弘扬亲邻睦友、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以及“礼让为先”等传统美德。这样既增强了判决的说理性和说服力,又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。当然,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加大学习的力度了。

(来源:《人民法院报》,作者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退休法官)

谈古
论今

调解工作的切入点——从房玄龄的判断说起

孙伟力

唐朝成立之前,中原呈三足鼎立的态势:河北有窦建德,河南洛阳有王世充,陕西长安有李渊、李世民父子。武德三年7月,李世民发兵洛阳,包围了王世充,结果战事不顺,近一年了也未攻下。

此时,李世民得到消息,窦建德要来救援洛阳。情势危急,李世民对是否撤兵回长安要进行抉择。原因有二:一是重兵围攻洛阳,长安空虚。若窦建德救援洛阳是假,发兵长安是真,那必须及早撤兵,否则都城就会被攻占。二是王世充已经快撑不住了,就这么撤兵,一年来的心血就白费了。

李世民举棋不定。有谋臣谏言:如果窦建德攻打长安,很可能长安西面的骑兵部落也会乘虚而入。一旦如此,后果实在太严重,还是要以大局为重,及早撤兵为好。

而宰相房玄龄果断地说:“窦建德不可能攻打长安,他一定是来洛阳。”他认为:“如果窦建德真想攻打长安,有更近的线路。现在他选了另一条路,就说明他可能有其他想法。窦建德是草莽出身,一直羡慕繁华大都市。洛阳是隋朝的首都,繁华无比。比起攻陷长安,窦建德显然更想拥有洛阳。”

李世民最终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,兵分两路,一部分继续围困洛阳,他则亲率三千余精兵去阻断救援。后因势利导一举灭掉了窦建德、王世充两大强敌,奠定了唐朝统一天下的基础。

为什么大多数人举棋不定的时候,房玄龄却能作出正确的判断?其实,包括李世民在内,大家当时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眼前的战事演变,即当前利益,而房玄龄的思考却在战局形势上,又进一步分析了对方的的人生经历和心理特点,从而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战略发展。

这就像法官做调解工作一样,如果仅仅局限于当事人的表面诉求,而没有抓住其性格特点和真实需求,往往会造成调解的过程、效果与当事人的实际意愿不相符合,甚至背道而驰,不仅起不到调解的作用,反而可能会增加双方的矛盾。

因此,做调解工作不能管中窥豹,也不能照方抓药,而应该因人而异、因案而异,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比如离婚案件中,一些当事人仅因家庭琐事一时冲动提出离婚,虽双方都有悔意,但碍于情面而互不相让,在法庭上态度强硬,坚决要求离婚。如果法官就案办案判决双方离婚的话,从法律上讲没有什么过错,但由于没能捕捉到当事人内心深处的最真实的意愿,就会使案件的处理结果存有遗憾。有的商事案件当事人在案件审理前对双方合作前景、公司业务的开展、是赢得经济利益还是社会声誉等方面未作充分、深远的思考,因此,法官应当耐心细致地析案说法,使其明白并接受案件处理的结果,否则,即便结果公正,也容易导致一方当事人因对判决内容不理解,或思想上难以接受而对裁判不满、抵触,易激化矛盾,进而会导致打击报复、故意伤害等情况的发生。还有的当事人之间并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,只是在他人的鼓动、撺掇下为了一口气而起诉,对这样的案件,法官应当对他们进行入情入理入法的耐心谈话,找到相关人员和组织对当事人进行劝导,促使他们理性诉讼。

调解,对法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不能完全被当事人的诉求所围困,就案办案、机械办案,而是应当对案件的化解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,从而发现并选择当事人看不见的战略选项,取得事半功倍的调解效果。只有让当事人在心平气和、深思熟虑的状态下作出决定,才能真正做到“息诉宁讼”“各得其所”,这才是调解价值的真正所在。

(来源:《人民法院报》,作者单位: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)

以泪 摄